

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 社会保障缺失

——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

张展新 高文书 侯慧丽

【摘要】 近来,在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研究中,城乡分割已不再是唯一的主要基点,区域分割开始受到重视。文章从解释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分析框架出发,推导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研究假设,并利用2005年上海等五城市“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实证发现,城乡分割因素和区域分割体制都对城市外来人口参保构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 城乡分割 区域分割 外来人口 社会保障

【作者】 张展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慧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保障缺失是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问题之一。关于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和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学术和政策研究,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共享了城乡分割模式。而在近期,围绕着这一论题的研究开始走出城乡分割模式的局限,区域分割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这一理论动向的背后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人口与劳动力管理的城乡分割体制的弱化和区域分割体制的强化。本文以解释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分析框架为基础,推导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的研究假设,并利用2005年上海等五城市“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

一、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研究的城乡分割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千百万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而言,涵义是双重的。在改革前,农村人口与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和农业;改革后,他们向城市流动是城乡分割体制的重大突破。但是,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取城市公共资源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似乎意味着城乡分割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续。因此,按照城乡分割思路观察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并解读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成为众多研究所遵循的理论模式或分析框架。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以“城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市民)”为对称的基本概念。作为进入城市的非本地农业户口劳动者的略缩语,“城市农民工”称谓包含了其户籍身份和就业身份。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中的相对地位研究以拥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城市职工或市民为参照群体。

第二,以城乡户籍分割为推理大前提。流行的观点是,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与市民身份不同,法律地位不同,在就业、居住、福利等方面权利不平等。这样,城乡分割体制在城市内部得到移植和复制(陈映芳,2005),农民工成为介于农民和市民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第三群体”(李强,2004)，“城乡二元结构”衍生出“城市二元结构”(侯力,2007)。

第三,多采用“两群体检验”实证研究程式。两群体观察和检验是指以农民工(及其家属)与城市职工(或居民)两大群体为抽样对象进行研究设计,对两群体差异进行经验描述,并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做统计检验,比较两群体之间在收入、福利、机会获取等方面的“净”差异,进而估计城乡分割不平等效应的强度。

第四,以取消城乡户籍分割为主要政策取向。遵照这一模式的学者普遍严厉批评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体制,通常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户口差别放在政策建议的首位。

第五,将“外来市民”视为特殊案例并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城市外来人口以农民工及其家属为主体,但持其他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外来市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外来市民与农村体制没有关系,因此无法纳入城乡分割分析框架。对于城市户籍外来人口,研究者或在抽样阶段排除、筛选掉,或在分析时将这类个案剔除,以保持其研究的内在逻辑。

作为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城市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的研究也曾遵从了上述城乡分割模式。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参与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过低、参加社会保险后又大量退保三种现象。前两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新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就存在,主要解释也是城乡分割式的,即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但由于没有非农业户口,不能享受与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同时,长期持续的城乡分割体制既影响城市管理部门和企业,也制约了农民工本身的素质,农民工在法律范围内参加社会保障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这样,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体制及其影响一直被视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根源。

然而,最近一些城市出现了城乡分割难以解释的农民工参保后退保行为(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这主要是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一些学者把参保后退保的主因归结为社会保障地方统筹与农民工流动性的矛盾,这样,城乡分割观点与社会保障地方性观点并列起来,构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多因素解释(崔传义,2006;彭宅文、乔利滨,2006)。一个进一步偏离城乡分割模式的思路是把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视为“本地—外来”分割的后果,并认为这种分割是城市社会保障区域分割在城市内部的反映(张展新,2006)。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与劳动力治理上的区域分割问题。陈映芳(2005)在坚持用城乡户籍分割或二元结构来解释城市农民工地位的同时提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正在缩小本地人口的城乡户籍差别,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可能演变为地区间或城市间不平衡。李春玲(2006)指出,目前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分离和地区隔离的分离体系”,这种结构导致“具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这些观点,开始偏离城乡分割模式,把人们的视野引向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发展的人口与劳动力的区域分割。

二、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整合框架

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与劳动力分割体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实施主体和运行机制,并派生出不同的不平等格局。城乡分割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确立的,是在中央政府完全主导下,通过中央计划和从中央到地方及单位的行政组织

体系来实现的;城乡分割的后果是城乡间收入反差与市民/农民社会分层,而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产生了平均主义倾向——非阶层化(Parish,1984)。区域分割则是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的,其运行主体是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立法和地方政策进行实施;区域分割是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区域(城市)内部的“本地—外来”分割与分层的主要原因。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都与现行户籍制度有关,但前者基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户口登记地为基础。

对区域分割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这就是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分割体制的弱化和区域分割体制的强化。城乡分割是计划经济时期人口与劳动力管理的首要特征,城乡分割体制的基本制度是分城乡限定居住和就业的户籍制度与以此为基础的偏向城市的福利及保障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和城市改革的深入,城乡分割体制不断弱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就业、保障体制改革都取得重大突破,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迁移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小城镇层面或在城市内部,“农转非”的通道已经敞开,城乡户籍分割的“围墙”已经被拆除;最具城市偏向意义的国有企业劳动制度已经基本上被劳动力市场用工制度所取代,在城市就业和保障获取上,“农业户口”不再是一个根本性身份障碍。同时,中央政府已经完全停止扮演城乡分割主体的角色,并运用法律、行政、财政和舆论等多种手段改善城市农民工的地位。因此,城乡分割作为一个体制已经基本终结。

在城乡分割体制衰落的同时,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分割得以形成与发展。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分割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型的。区域分割以地方政府扩权为重要前提条件,随城市改革深化而强化。目前,区域分割的重心已经从最初的排挤外来劳动者、保护本地人口就业转向社会保障的“本地—外来”分割:在地方分权、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社会保障获取上均处于不利地位。区域分割还表现在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对外来人口各种形式的排挤。财政的地方分权和福利的地方再分配机制是城市政府实行社会保障“本地—外来”分割的内在原因,是人口和劳动力区域分割的体制根源。区域分割还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条件——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因此,鉴于派生着新的权利不平等、社会分层和社会公正问题,区域分割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

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此消彼长呼唤着学术研究走出城乡分割模式的局限,开拓新的分析框架。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研究的整合框架——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张展新,2007)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这一解释的基点是:(1)区域分割体制已经取代城乡分割,成为人口和劳动力分割的新的主导结构;(2)虽然城乡分割体制已经终结,但这一体制的影响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表现为农民工的教育文化素质不高、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以及城市存在轻视外来农民工的意识或观念等方面。这样,体制性的区域分割与城乡分割体制的“遗产”或“痕迹”都会产生影响,造成本地市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应当从区域分割体制、城乡分割历史因素两个视角出发,来认识、解释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相对地位。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要求把外来市民引入实证程式,用“三群体检验”代替外来农民工、本地市民两群体检验。从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两方面看,外来市民即外来非农业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有外地户籍的相对劣势,又有非农业户口的相对优势。这一二重性具有特别的检验意义,即外来

关于中国改革时期城乡分割体制和区域分割体制变迁的更详细讨论参见张展新,2007。

市民与本地市民的地位或机会差异是区域分割的效应,而农民工与外来市民之间的差异是城乡分割因素的影响。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包含着与城乡分割研究模式不同的政策涵义。城乡分割模式呼唤取消城乡身份差别的户籍改革,进而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权利地位。而二重分割解释认为,这一改革对农民工地位不会再有大的实质性影响,未来户籍改革的重点、难点是大城市户口登记地制度的改革,是缩小本地人口与包括农民工、外来市民在内的外来人口之间的身份及权益差别。

三、作为城市外来人口一部分的外来市民

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职工还保持着高度稳定的就业特征。不用说向其他城市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内部,职工跨单位的工作转换也很少。因为在这一时期内,城市的国有企业体制和劳动体制还没有受到大的触动,城市外来流动

表1 外来市民、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市民人口学特征和职业特征

基本特征	外来市民		外来农民工		本地市民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650	50.8	15705	53.8	87664	50.7
女	4511	49.2	13466	46.2	85207	49.3
总计	9161	100.0	29171	100.0	172871	100.0
年龄(岁)						
15岁及以下	1048	11.4	3580	12.3	29244	16.9
16~25	2722	29.7	10023	34.4	27822	16.1
26~35	2478	27.0	9636	33.0	32755	18.9
36~45	1080	11.8	3411	11.7	33436	19.3
46~65	1381	15.1	2138	7.3	37012	21.4
66岁及以上	452	4.9	383	1.3	12602	7.3
总计	9161	100.0	29171	100.0	172871	100.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34	15.3	8635	31.2	34476	30.0
初中	2584	29.5	15230	55.0	50547	30.7
高中	1764	20.1	2754	10.0	32681	19.9
中专	1328	15.2	797	2.9	17748	10.8
大专及以上	1746	19.9	252	0.9	29037	17.6
总计	8756	100.0	27668	100.0	164489	100.0
职业						
中高端职业	1620	32.6	1338	6.4	33448	43.4
一般职业	3347	67.4	19748	93.6	43577	56.6
总计	4967	100.0	21086	100.0	77025	100.0

注: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这三大职业类别定义为中高端职业;其余职业类别,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均定义为一般职业。

资料来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人口几乎完全来自农村。1995年以后,城市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城市就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职工和市民原来享有的相对于农村人口的种种优势急剧缩减。2000年后,下岗和失业“双轨”制度向单一的失业保障制度完全“并轨”,原国有职工成为与其他劳动者(包括外来劳动者)一样的自主选择、自我负责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在如此剧烈的体制变迁之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走出户籍所在城市,加入流动人口大军。按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推算,在城市外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人口已达23.9%,其余是农业(户口)人口,占76.1%。这是7年前的情况。目前,外来非农业人口(外来市民)在城市外来人口中的比重会更高,并已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重要群体,这也是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及其三群体检验的一个立论基础。表1运用“五普”抽样数据,描述外来市民的人口

学特征和职业层次特征,并将其与城市本地市民和外来农业人口两大群体进行比较。

从“五普”抽样数据统计结果推断总体,可以说,外来市民是一个既不同于外来农民工,又有别于本地市民的人口社会群体。3个群体性别分布比较平均,只有外来农民工的男性比重重要略高一些。外来市民的年龄结构比本地市民更年轻化。外来市民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外来农民工,甚至高于本地市民。从这一点来说,外来市民是一个人力资本禀赋更高、更富有竞争力的群体,他们对流入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应该更大,职业地位也应该更高。但在职业层次上,他们却没有表现出比本地市民高的职业地位。三群体中,外来农民工职业地位最低。对于外来市民而言,年轻型年龄结构折射出其市场化特征和流动属性,教育程度高说明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政策惠及了这一群体,而职业层次不及本地就业人口可能体现了在户口登记地限制基础上的区域分割。

四、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假设和检验思路

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定量研究的重点,是外来就业人口与本地就业人口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可能性比较。按照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劳动者参保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关系为准绳,没有本地户口的限制,因此对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敞开了参保大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2006)。但是,在区域分割的条件下,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难以稳定就业和获得地方公共服务,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当他们跨统筹区域流动时,不能带走就业单位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也有在新的地方接续的问题。面临这些问题与障碍,外来人口或就业于社会保险覆盖率低的部门,或降低其参保意愿,或在参保后退保。外来非农业人口的参保率应当低于城市本地就业人口的参保率,这种差异体现了区域分割效应。城市外来农民工既受制于区域分割,也受到城乡分割因素的影响,参保率应当比外来市民还要低。因此,从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出发,可以假设城市本地人口、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依次递减。

下面推导这组假设在 Logistic 回归中的数量表达形式。首先,定义按照户籍划分的人口群体虚拟变量:本地人口为 g_1 (本地人口 = 1),外来市民为 g_2 (外来市民 = 1),外来农民工为 g_3 (外来农民工 = 1), b_{g1} 、 b_{g2} 、 b_{g3} 依次为对应的回归系数; p_1 、 p_2 、 p_3 依次为这 3 个群体样本参加某一社会保险的概率。

假定城市人口参保只受到城乡分割因素的影响,外来市民样本不进入回归分析,进行“二群体检验”,城市人口参保概率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text{logit } p = b_0 + b_{g1} g_1 + b_i x_i \quad (i = 1, 2, \dots) \quad (1)$$

其中, p 表示参加某一社会保险的概率,“ p 的罗吉斯蒂概率单位”(郭志刚,1999) $\text{logit } p = \ln \left[\frac{p}{1-p} \right]$ 是 p 的单调增函数, b_0 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自变量 x_i 包括可能影响城市人口参保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劳动力市场变量(工资水平、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行业等), b_i 是对应的回归系数。由于此时,当 $g_1 = 0$ 时, $g_3 = 1$,根据(1)式,有:

$$\text{logit } p_1 - \text{logit } p_3 = b_{g1} \quad (2)$$

如果此时 $b_{g1} > 0$,则 $\text{logit } p_1 > \text{logit } p_3$,进而有 $p_1 > p_3$,本地人口参保概率更大。城乡分割假设因此得到验证。

假定城乡分割因素和区域分割体制对城市不同人口社会群体参保都构成影响,且外来市

民样本也进入回归分析模型,“三群体检验”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text{logit } p = b_0 + b_{g1} g1 + b_{g2} g2 + b_i x_i \quad (i=1, 2, \dots) \quad (3)$$

这里 b_{g1} 依然等于 $\text{logit } p1$ 与 $\text{logit } p3$ 的差,但 $b_{g1} > 0$ 不再仅仅意味着城乡分割。从式(3)得到:

$$\text{logit } p2 - \text{logit } p3 = b_{g2} \quad (4)$$

如果 $b_{g2} > 0$, 则 $\text{logit } p2 > \text{logit } p3$, 进而有 $p2 > p3$, 外来市民与农民工相比, 参保概率更大。由于外来市民相对于农民工的优势就是不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 城乡分割因素作用的假设得到验证。

根据(3)式, 还可得:

$$\text{logit } p1 - \text{logit } p2 = b_{g1} - b_{g2} \quad (5)$$

如果 $b_{g1} > b_{g2}$, 则 $\text{logit } p1 > \text{logit } p2$, 进而有 $p1 > p2$, 本地人口与外来市民相比, 参保概率更大。由于本地人口与外来市民之间的差异来自区域分割, 区域分割体制影响参保的假设得到验证。

由于 $b_{g1} = b_{g2} + (b_{g1} - b_{g2})$, 根据公式(4)和(5)可知, 在“三群体检验”中, 当 $b_{g1} > b_{g2} > 0$ 时, b_{g1} 代表了城乡分割因素和区域分割体制两种作用的叠加, 而不再仅仅是城乡分割因素影响的指示器。这表明, 当外来市民被引入统计分析后, 对本地人口与外来农民工参保机会差异的解释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单一的城乡分割转向城乡和区域的二重分割。

五、上海等五城市调查数据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 2005 年 5~7 月, 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城市进行了“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是城市的本地家庭户和非本地户口的外来家庭户。调查问卷涉及了被调查家庭户的全部成员, 但填答信息主要是针对 16 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城市家庭户样本中, 家庭成员主要是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本市市民; 在外来家庭户样本中, 家庭成员既有农业(户口)人口, 也有非农业(户口)人口。调查回收劳动年龄人口个人问卷 10 734 份, 其中, 涉及本地人口 6 406 人, 占 59.69%; 外来农民工 3 578 人, 占 33.33%; 外来市民 750 人, 占 7.00%。五城市被调查人口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我们使用上海等五城市数据来做关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的三群体检验, 分析就业人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可能性。这些社会保险都是与就业和劳动关系相关联的。为此, 在数据样本中, 删去了失业人员、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和自我雇佣劳动者样本。目前,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尚未完全实行社会保障改革, 因此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劳动者样本做了删除。最后, 考虑到在一些行业, 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只有少量的样本, 没有分析的意义, 我们将这些样本也删除了。在进行了上述删减之后, 劳动力样本数量为 4 264 人, 其中, 本地人口 2 841 人, 占 66.63%; 外来农民工 1 142 人, 占 26.78%; 外来市民 281 人, 占 6.59%。

表 3 报告了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参保概率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对于每一项社会保险, 都有两个回归模型: 模型一是不含外来市民样本的“二群体检验”回归分析,

除了上海等 5 个城市, 该调查还在其他 7 个城市(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大庆)中, 每个城市各抽取了 400 户外来家庭, 形成的个人问卷主要来自外来人口。这样, 这 7 个城市的数据不包括本地人口, 不能用于本文的三群体检验, 因此本文只使用上海等 5 个城市的数据。

模型二是全样本“三群体检验”回归分析。估计这两种模型回归系数的目的是将这两种有区别的实证研究结果做比较。为了确定不同人口社会群体参保概率的“净”差异,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这三组人口学变量和就业单位性质、行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劳动力市场变量,这些虚拟变量都可能对样本参保概率产生影响。此外,还把调查的样本城市作为虚拟变量引入回归,以控制不同群体参保的城市差异。

Logistic 回归结果支持了“城市本地人口、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依次递减”的假设。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模型二回归中,“外来市民”与“本地人口”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而且都在 1%水平

上显著,统计推断意义很强,显示了这两个群体比农民工更高的参保概率。“本地人口”的回归系数值明显大于“外来人口”的回归系数值,而且这一回归系数差具有显著的统计推断意义。这意味着本地人口的参保概率大于外来市民。

同模型二相比,模型一少了外来市民变量和相应的回归系数。此时,“本地人口”的回归系数依然是正的并且显著,而且这些数值与模型二中的相对数值间的差异很小。但由于是“二群体检验”,模型一中的关于就业人口的回归结果被完全解释为在城乡分割体制及其影响因素作用下,本地市民比外来农民工有更高的参保概率。这说明,模型一与模型二背后的理论框架不同,分析的程式不同,对回归系数的解释也不同,即使这类系数的数值变化不是很大。

表 3 显示的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提供了更多的结果。在国有企业就业明显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概率。签订劳动合同也有类似的一致性的正作用。年龄、教育和行业都对参加社会保险构成影响,但需要针对不同保险项目来具体观察。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上海市在全面推进社会保险上走在其他 4 个城市的前面。

六、结论与思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城市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城乡分割作为一个体制或一组正式制度安排已经终结。外来城市人口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一部分。在城乡分割体制没落和城市外来人口多样化的同时,以地方政府财政和经济自主权为基础的人

表 2 五城市调查劳动力个人样本描述

基本特征	外来市民		外来农民工		本地市民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97	52.93	1861	52.01	3162	49.36
女	353	47.07	1717	47.99	3234	50.64
年龄(岁)						
16~25	193	25.73	783	21.88	1018	15.89
26~35	278	37.07	1400	39.13	804	12.55
36~45	156	20.80	1010	28.23	1396	21.79
46岁及以上	123	16.40	385	10.76	3188	49.77
婚姻状况						
未婚	194	25.87	668	18.72	1191	18.62
已婚	556	74.13	2901	81.28	5206	81.38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0	8.00	947	26.56	661	10.36
初中	265	35.33	1957	54.88	1683	26.37
高中	198	26.40	504	14.13	2013	31.54
中专	80	10.67	89	2.50	670	10.50
大专及以上	147	19.60	69	1.93	1356	21.23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问卷调查。

表 3 五城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 Logistic 回归系数

变 量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就业人口身份(外来农民工为参照组)						
外来市民	—	4.377 ***	—	5.325 ***	—	1.840 **
本地人口	15.292 ***	15.260 ***	11.875 ***	12.487 ***	6.919 ***	6.950 ***
性别						
男性(男性 = 1,女性 = 0)	1.151	1.175	1.154	1.200 *	1.161	1.152
年龄(16~25 岁为参照组)						
26~35 岁	3.295 ***	3.223 ***	2.223 ***	2.182 ***	1.993 **	2.014 ***
36~45 岁	6.105 ***	6.030 ***	3.006 ***	3.165 ***	2.503 ***	2.583 ***
46 岁及以上	8.758 ***	8.548 ***	5.068 ***	4.940 ***	1.896 **	1.893 **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1.648 +	1.714 +	1.202	1.067	1.249	1.096
高中	2.555 ***	2.733 ***	1.575	1.398	1.591	1.441
中专	4.768 ***	4.814 ***	2.414 **	2.054 *	1.432	1.279
大专及以上	3.820 ***	3.954 ***	2.381 **	1.978 *	1.775	1.592
单位类型(个体企业为参照组)						
国有企业	2.680 ***	2.853 ***	3.989 ***	3.906 ***	3.082 ***	3.102 ***
集体企业	1.772 **	1.792 **	1.882 **	1.963 **	2.380 ***	2.554 ***
私营企业	1.035	1.032	0.986	1.021	1.073	1.102
“三资”企业	1.825 **	1.875 **	1.804 *	1.727 *	1.860 *	1.818 *
其他	1.120	1.124	1.300	1.269	0.996	1.018
行业类型(建筑业为参照组)						
制造业	2.306 ***	2.200 ***	1.528 **	1.435 *	1.707 ***	1.681 ***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1.497	1.641 +	1.290	1.217	1.185	1.168
社会服务业	4.631 ***	4.530 **	4.160 **	3.650 **	1.944	2.042 **
劳动合同状况						
劳动合同(签订 = 1)	3.335 ***	3.306 ***	3.267 ***	3.503 ***	2.658 ***	2.761 ***
城市(西安为参照组)						
上海	1.869 ***	2.050 ***	2.408 ***	2.580 ***	0.687 *	0.676 **
武汉	1.500 **	1.647 ***	0.933	0.944	0.191 ***	0.191 ***
沈阳	1.080	1.122	0.916	0.952	0.568 ***	0.600 **
福州	1.889 ***	2.048 ***	1.081	1.090	0.481 ***	0.489 ***
个案数	2749	2908	2737	2913	2691	2865
- 2 Log likelihood	998.199	1076.944	1112.070	1196.740	897.380	1180.348
Model Chi-Square	1768.03 ***	1843.05 ***	1546.35 ***	1610.67 ***	1125.24 ***	939.75 ***

注: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问卷调查。

口与劳动力的区域分割不断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解释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分析框架是对过去约定俗成的城乡分割模式的一个替代尝试。

以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及其“三群体检验”实证分析程式,为进行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基础。据此假设,城市本地人口、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概率依次递减。然后,这些假设通过了“证伪”检验。这样,在经验层面,我们获得了城市本地人口、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工这 3 个城市群体的社会保险获取不平等的发现。我们还按照城乡分割模式及“两群体检验”,设计了不同的模型,估计了有系数,并与

“三群体检验”模型做了对照,从而在实证分析具体过程及其结果解释上展示了两种研究模式的差异。这种比较表明,我们的发现是城乡分割模式下的经验研究所不可能获得的。

本文的研究发现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观察结果,而是从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出发推导研究假设、再检验假设后形成的结论。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研究而言,这是对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增加了这一理论解释的可信性,为发展“城乡分割后”时期的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知识积累。

城市三大人口社会群体参保差异的结论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些政策启示。(1)涉及外来人口的政策设计不应局限于农民工,而应该把外来市民涵盖进来。(2)治理城市外来人口保障缺失问题的重心要转向区域分割,提升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改革户口登记地制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3)为了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障中的地位,需要强调解决制度操作上的“城乡差别”,消除制度歧视,同时加强农民工的素质和维权意识。

本文的结论只是初步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仅是指导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研究的一个粗略的概念化分析框架。关于区域分割体制和城乡分割历史因素对个人参保行为、参保机会的影响,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具体的作用路径。为此,可能需要以此为目的,专门设计抽样调查。这一研究需要深化和扩展,需要广泛的学术对话,才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形成新的取代城乡分割模式的研究取向。

参考文献:

1. 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2. 崔传义(2006):《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新经济导刊》,第9期。
3. 郭志刚(199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2006):《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报告》,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5. 侯力(2007):《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人口学刊》,第2期。
6. 李春玲(2006):《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社会学研究》,第5期。
7. 李强(2004):《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彭宅文、乔利滨(2005):《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困境与出路》,《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
9. 张展新(2006):《城镇社会保障的“本地—外来”分割与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开放导报》,第6期。
10. 张展新(2007):《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人口研究》,第6期。
11.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犁)

ABSTRACTS**The Extension of the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Health Life Expectanc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hinese Oldest-Old***Zeng Yi Gu Danan Kenneth C. Land · 2 ·*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disabled life expectancies based on conventional multi-state life table methods are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d due to assuming no functional status changes between age x and death. We present a new method to correct the bias and apply it to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f about 9000 oldest old Chinese aged 80-105 collected in 1998 and 2000. In our application the age trajectories of disability (ADL) status-specific death rates and ADL stat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of the oldest old were firstly investigated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We report estimates of bias-corrected disabled and active life expectancies of the Chinese oldest old, and demonstrate patterns of large differentials associated with initial status, gender and advances in ages. Employing combined information on ADL disabilities and length of having been bedridden before dying, we analyze gender and age patterns of the extent of morbidity before dy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debates concerning the hypothesis about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Mobility, Deprivation, Exclusion and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ecurity Right*Deng Dasong Hu Hongwei · 14 ·*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is a trend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 social process of mobility, residency, and integration. However, a phenomenon currently observable in China is mobility without residency and residency without integration. This is because intrinsic citizenization, which is indicated by self-positioning and self-identity, lags behind extrinsic citizenization. By mean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on self-identity,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variations in education, age, and marriage affect intrinsic citizeniz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ose is the deprival of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hip, specially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This conclusion implies some advices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An Outl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Based on Population Trends*Huang Rongqing · 25 ·*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s 1982, 1990 and 2000 population censu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municipaliti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were all increasing in the period 1982 to 2000 but with regional variation. Such increases were not due to spatial changes, but due to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per se; not because of natural increases of population, but becaus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results of population growth are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etropolises and giant cities. Population increas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st comm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ws in the cities were from suburb to outskirts, then to central areas, suggest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cities of China are still in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growth and extension, i. e. in urbanization; only the population flow in Shanghai was from central areas to outskirts, then to suburb in the 1990s, indicating its reaching the period of population suburbanization.

Urban-rural Divide,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Acces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ocial Security Entitlement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and Other Four Chinese Cities*Zhang Zhanxin Gao Wenshu Hou Huili · 33 ·*

In recent literature on insufficient acces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ocial security entitlements, urban-rural divide has no longer been the sole account,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began to draw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integrating urban-rural divide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explaining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of cities' floating population to loc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formulates research hypothese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and uses 2005 *China's Urb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tudy*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Shanghai and other four Chinese citie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the legacy of urban-rural divide and the system of regional segmentation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